

政治体中的信徒

——公民困境：群体资格路径

方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对作为宗教徒的公民而言, 他们对跨国家的宗教共同体的忠诚可能超越对政治体的忠诚, 从而成为政治体的离心力量。这种现象可称之为信徒—公民困境。这种困境已对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国家建设构成严峻挑战。在叠合认同构念的基础上, 论文试图基于行动者的多元群体资格来初步分析和解释这种困境。

关键词: 信徒—公民困境; 叠合认同; 多元群体资格; 灵性资本; 生命资本

中图分类号: B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09)04-0089-07

导 论

政治体中的信徒—公民困境

政治体的典范形式, 到目前为止, 依然是国家, 即占有一定领土并能合法垄断暴力的政治实体。尽管国家建立的路径、历史遗产和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存在差别, 但“公意”(general will)即所有人民的一致同意, 是也应该是政治体建立的规范基础和合法化来源, 它以宪法作为共同而超然的政治语法(陈端洪, 2007)。因此, 政治共同体的规范原则和合法化来源, 应该奠基于哈贝马斯所勾画的“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情操之上(Habermas, 1994; Michelman, 2001), 以超越和统合共同体内部的不同族群、宗教、语言等多元文化共同体的差异。在此意义上, 政治体作为“想象的共同体”, 也是以民族记忆和英雄传奇为基本素材的道德共同体和牺牲共同体(the sacrifice community)(方文, 2008a: 167)。

在政治体公民的多元群体资格和多元社会认同结构中, 其政治共同体的群体资格和公民认同及国家认同, 应该占据优先地位, 以超越地域、族群、宗教和语言的分歧和差异(方文, 2008b: 147)。但对作为宗教徒的公民而言, 他们对跨国的宗教

共同体的忠诚可能超越对政治体的忠诚, 从而成为政治体的离心力量。而这就是信徒—公民困境。

信徒—公民困境, 也急迫地体现在中国社会转型中, 对中国国家建设构成现实的严峻挑战, 其载体主要是藏独和疆独势力。藏独和疆独的社会心理意涵, 有两方面含义。对这些分裂势力而言, 他们企图用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来凌驾甚至替代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 而对国际敌对势力而言, 他们企图用种种方式来丑化和打击中国人的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认同信心(identity confidence)。其中, 极端的宗教认同成为信徒—公民困境的典型案例。

宗教认同：叠合认同

基于萨默斯的认同叙事论(Somers, 1994), 阿默曼发现宗教认同的建构/重构, 主要是以宗教叙事(religious narratives)作为建构因子。尽管阿默曼质疑萨默斯把社会行动还原为文本和言辞的合理性, 但她明晰地主张在以肉身呈现的宗教行动中, 宗教叙事具有核心地位。宗教叙事, 是信徒以“神圣他者”(Sacred Other/s)为核心的多重叙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Ammeman, 2003)。以肉身在场为出发点, 信徒在宗教制度所勾画的框架下, 在

收稿日期: 2009-03-08

作者简介: 方文, 男, 安徽枞阳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转型: 转型心理学的路径》(08BSH063),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转型心理学的基本议题: 理论和实证研究”(NCET-08-0025)。

同伴之间,在和神圣他者的私人沟通中,不断叙述平安、喜悦和恩典,也不断言说焦虑、困扰和挣扎。

但对任何的宗教徒而言,他并不仅仅只是宗教徒,他还参与世俗的社会生活,是国家公民。信徒和公民之间的张力因此得以呈现。逻辑上,宗教徒和公民有三种可能关系。第一种类型是宗教徒/公民合一,如在现代神权国家中;第二种是信徒的宗教认同促进其公民认同的建构(如Lichteman, 2008);第三种就是本文关注的信徒—公民困境。

杨凤岗通过对美国华人基督徒(Christian Chinese Americans)的民族志研究,洞悉了美国一华人—基督徒宗教皈依和认同建构的精妙逻辑:如何成为基督徒,如何同时成为美国公民,又如何同时有选择地保持其中国文化共同体的资格,成为不停息的认同努力(identity work)的核心。杨凤岗发现,美国华人基督徒既不是放弃族群认同被动地接受同化,也不是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而是同时圆润地建构和重构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Yang, 1999: 27—28)。或者说,美国华人基督徒的认同建构过程就是将这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而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独具特征,从而成就其叠合认同(adhesive identities)(Yang, 1999: 194—195)。

行动者的多元群体资格

叠合认同模型,深刻地洞察了美国华人基督徒三元认同建构的独特过程和逻辑(方文, 2008c)。进一步,任何语境下,所有人包括宗教徒都同时负荷多元群体成员资格,以缔造其独特的多元认同和“多元一体”的完整生命。其核心和实质是每个个体作为能动的行动者而不断获得的多元群体成员资格。

在任何社会语境之下,都存在既定的社会分类(social classification)或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体制,它同时也是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的一部分(Moscovici, 2000)。无论是基于先赋的品质还是后致的特征,甚至是特定制度化的标定,人在生命历程中被归属于不同的群体,拥有多元群体资格(multiple memberships)。先赋的品质,是和个体出身相关联的社会范畴属性,如年龄、性别、族群,甚至是户籍和出身地;后致的

特征,则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主动寻求的社会范畴属性,如教育水平和个人职业,甚至是消费和品味;而由制度化的标定所赋予的特征,则是特定制度语境对人的社会范畴属性的限定,如城里人和乡下人,甚至是藏传佛教传统中对喇嘛、班禅和活佛的选择过程。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实际上可具体化为人的多元群体资格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征过程。而对宗教徒或宗教行动者而言,宗教群体资格只是其多重群体资格的一个面向。

本文目的是在叠合认同构念的基础上,基于行动者的多元群体资格(方文, 2008a; 2008b),来初步分析和解释:何为宗教徒?宗教徒何为?如何区分宗教徒的圣/俗生活或宗教生活/公民生活?以求为信徒—公民困境提供初步解决方案。

一、何为宗教徒?

宗教皈依

皈依,是指非宗教信仰徒变为一种宗教信仰徒的过程,或者从一种宗教信仰徒变成另一种宗教信仰徒的过程。对已经禀赋多元群体资格的行动者而言,皈依的结果是他/她主动地获得一种新的群体资格,即宗教群体资格。而对没有自主判断和行为能力的个体如婴儿或昏迷病人而言,我们基于推定同意(inferred consent)原则。这有两层含义。

第一,我们推定他们的法定监护人的意愿是其意愿的合适代表;第二,如果他们有自主判断和行为能力,我们推定他们的行动意愿和其法定监护人的意愿一致。

基于多元群体资格,可重新解释一神教和多神教之间的区分难题。第一,宗教群体资格的权重有别。对一神教而言,其宗教群体资格是单一而排他的;而对多神教而言,宗教群体资格可以是多重而叠加的。一神教的群体资格之于皈依者更为珍贵,更为凸显。

第二,入会条件(conditions of initiation)有别。一神教是排他性的,多神教是非排他性的。一神教的群体资格的获得,要经受更严厉的考验。入会条件的差别,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心理意蕴(Aronson and Mills, 1959; Festinger, 1957)。严厉的入会条件,会促进皈依者更高的承诺和归属感。

第三,入会仪式(rites of initiation)有别。马歇尔构造了有关仪式活动的综合理论模型仪式实践论(the theory of ritual practice)。在马歇尔的模式里,仪式活动有两个基本元素:仪式给参与者所创造的共在情景(co-presence)和仪式实践(ritual practices)或仪轨,有种种社会心理过程和机制,渗透其中(Marshall, 2002: 360—380)。共在情景和仪式实践,在一神教更为庄重而神圣的仪式中,使参与者能超越俗世的羁绊,体验到超验的价值,并因此强化自身的信仰。

第四,去皈依的后果有别。如果皈依者对其特定宗教群体资格没有认同感,他就会忽视或放弃这种资格,或者寻求新的宗教群体资格。这个过程,可称之为去皈依(de-conversion)。皈依和去皈依,是宗教变迁的基本动力之一。对一神教而言,去皈依的社会心理后果更为严重,也更为持久。

宗教群体资格的识别和觉知

社会认同论理论家发现任何群体资格的识别和觉知,基于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Tajfel and Turner, 1986: 15—16)。

范畴化过程具有交互性和动态性。其一,行动者一出生,就生长在既定的社会范畴化语境中,被分类和标定。其二,行动者以自我为中心,对自身和在场的他人进行分类,把自身和他人纳入确定的群体之中,但同时行动者自身也被在场的他人所分类。其三,社会范畴化的基本策略是(多重)二元编码(the binary codings)(Beyer, 1998; Chaiken et al., 1999)。基于特定显著的分类线索,在场的所有人以分类者为核心,被纳入内群体和外群体之中。尤其明显的是在宗教场域中,通过社会范畴化,宗教群体与外群体得以区分。其四,行动者的分类和他人的分类具有最低限度的重叠共识。

作为范畴化主体,行动者并不是宗教市场论学者所鼓吹的“理性经济人”,他/她是“被驱动的策略家”(the motivated tactician)(方文, 2005; Taylor, 1998)。“被驱动的策略家”,意味着行动者有可资利用的多元信息加工策略,而这些策略的选择,则基于行动者的目标、动机、需要以及社会环境中的力量。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社会认知加

工过程,总是为了满足其目标和动机。因此,有关行动者的线形图像,正被一个复杂的能动者所替代。他能在复杂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情景中,对范围广泛的信息如即时的社会语境、自身的内在状态和远期目标,保持高度的敏感,并能援引可资利用的社会和文化资源,主动地认知和建构社会实在。

何为宗教徒?

对宗教行动者而言,在其宗教群体资格之外,他/她还同时负荷其他多重的群体资格;只有在其宗教资格凸显时,他/她才是宗教徒。但其宗教资格如何凸显以引导其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就是社会知识如何激活的难题。当代的社会认知研究对此有典范性的研究成果。

群体资格的获得过程,也就是和群体资格有关的集体记忆和社会知识的习得过程。行动者的社会知识体系,并不是逻辑连贯的,而是“领域—特异的”(domain-specific),分别对应于不同面向的语境。这些“领域—特异的”的社会知识,在特定语境下处在潜伏状态,等待被激活和调动。如果与特定群体资格相对应的“领域—特异的”的社会知识或社会范畴被激活和调动,就可以逻辑合理地推断他的群体资格被激活和调动,并相应地引导和主宰后续的心理和行为。因此,多重群体资格的行动者在具体情景下凸显其特定群体资格的问题,就可转换为行动者的社会知识体系中“领域—特异的”的社会范畴被激活和调动的问题。

在希金斯启动研究(priming)(Higgins, et al, 1977)的基础上,社会知识的激活机制被系统地揭示出来(Higgins, 1996)。第一是可接近性或可及性(accessibility)。通过范畴启动或被频繁使用,社会知识体系中与特定范畴相对应的“领域—特异的”知识从潜伏和沉睡状态转变为准备状态或待命状态(readiness)。处在准备状态或待命状态的社会知识,类似于行动者手头的工具箱(tool-kit),时刻准备派上用场。

第二是可用性(applicability)。待命状态的社会知识或工具箱,在面对问题情景或任务时,存在两种情况:吻合或者不吻合,匹配或者不匹配。只有吻合或匹配的待命知识,才能被应用,亦即具有可用性,或称之为“吻合优度”(goodness of fit)。而

那些不匹配的知识, 尽管被激活而处在待命状态, 它们也不会被应用, 就像工具箱中不合用的工具一样。可接近性和可用性主要关注行动者的因素。

在此之外, 希金斯主张特定情景中刺激或线索的显著性(salience)也会激发特定范畴的激活。如在我们所研究的基督新教场域中, 与基督新教有关的刺激无处不在, 具有高度的显著性。它必然会从信徒—非信徒这个维度在信徒身上激活宗教范畴, 并且同时在非信徒或慕道者身上激活“我不是信徒”的知识。

二、宗教徒何为?

宗教群体资格的积极特异性: 群际比较

宗教群体资格, 对宗教徒而言, 具有积极特异性(positive distinctiveness), 也就是具有积极的认知/情感/价值意蕴, 即社会认同感。而这种积极特异性, 通过群际比较过程(intergroup comparison)而得以强化。

费斯汀格社会比较论的假设—演绎体系, 最先来系统解释和预测个体的能力和观点(Festinger, 1954)。但费斯汀格的社会比较过程只是内群的人际比较, 它仅基于个体的人格特征。泰费尔则把人际比较过程拓展至内群与外群之间的群际比较(Tajfel, 1981: 254—267)。特定群体资格的显著意义, 只有在和他群体的关系中, 亦即在与他群体的比较和对比中, 才呈现出来(Tajfel, 1981: 256—259)。我属群体(one's own group)的评价, 决定于对特定的他群体的参照。这种参照, 依据价值—负荷的品质和特征通过社会比较而获得。通过内群/外群比较, 积极评价我属群体的压力, 导致社会群体力图把自身和其他群体区别开来。

概言之, 有两类基本的社会比较过程: 内群与外群之间的群际比较和内群的人际比较。通过内群和外群之间的群际比较, 产生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外群同质性(outgroup homogeneity)甚至是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对特定宗教群体而言, 与其他宗教群体以及非宗教群体的群际比较, 不断地强化自身内群的积极特异性。

宗教内群分化准则: 灵性资本

内群人际比较是内群分化(ingroup

differentiation)和精英生产的基本逻辑。世俗社会群体中的内群分化和精英生产逻辑, 主要是基于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并形成特定的角色结构和地位结构。

而在宗教群体内部, 也存在不断的人际比较。我们的实地研究发现, 在宗教群体内部, 这些世俗社会中的分化逻辑是不相干的。宗教群体有其独特的内群分化和精英生产逻辑, 其准则或尺度是灵性资本(spiritual capital)(方文, 2005)。

宗教市场论学者也注意到这类问题。艾纳孔在其宗教市场论的图式中, 类比经济资本, 构造了“宗教资本”(religious capital)的概念。宗教资本, 是宗教信徒所拥有的“与特定宗教有关的技能和经验, 它们包括宗教知识、对教会议轨和教义的熟悉程度, 以及与宗教同伴的友谊网络”(转引自Verter, 2003: 158)。

斯达克和芬克把宗教资本理解为对特定宗教文化的掌握和依恋程度(斯达克和芬克, 2004: 150)。但这些宗教市场论学者, 对宗教生活的理解, 有致命的偏差: 他们都放弃或忽略了信仰的核心即信徒的情感承诺。请比较一个不信仰基督宗教的基督宗教学者和一个不识字的乡村虔诚基督徒之间的宗教文化修养。前者可能对《圣经》、基督教义以及基督宗教的历史演化和现状, 有系统修养, 但他不信; 而后者, 可能连上帝或基督这些字都不会认, 但上帝在她/她心中。

在布迪厄符号资本的基础上, 伏太尔构造了灵性资本的概念(Verter, 2003)。但伏太尔过分强调信徒功利性的灵性资本积累和传递的逻辑, 以求在社会层级化的激烈竞争中获得优势。就我们的实地研究而言, 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

基于伏太尔的理论研究, 灵性资本, 可界定为宗教徒在其灵性活动中劳动的积累和所蒙受的恩典(grace)。信徒的灵性努力是人的意志, 并不必然使之蒙恩; 恩典是神的意志, 是信徒被神宠爱、眷顾和拣选的可能性。

在宗教群体内部, 不同信徒所蒙受的恩典和自身的灵性努力是不同的, 其结果是灵性资本在不同信徒身上的分布是不一样的。正是这种不一致的分布, 使得内群分化和精英生产逻辑可以辨析出来。基于我们的实地研究, 灵性资本可从三

个方面进行度量:信仰的纯粹性程度(主观指标)、宗教行为的卷入性程度(客观指标)和宗教群体内部人际网络中的相对位置(社会指标)(方文, 2005)。

宗教徒何为?

特定群体资格一旦获得,它就是动态的,而不是凝固的。换言之,群体资格必然通过规则化的社会行为得以不断地彰显出来。它有两个基本功能。其一,规则化的社会行为,从外显的意义上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可觉知的群体标志。而这些群体标志是识别和评价群体资格的基本线索,同时也是群际符号边界的线索。这些标志,主要有话语行为模式、消费模式、容貌风度和品位。

其二,规则化的社会行为,是群体记忆和群体社会表征体系(Farr and Moscovici, 1984; Moscovici, 2000)的载体和启动因子(primes)。其结果是群体资格的显著性被不断地激活,群体社会认同和群体符号边界在行动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Lamont and Fournier, 1992; Lamont and Molnar, 2002)。

概言之,通过这些典范性的社会行为,宗教徒在行动中不断地强化自身的宗教资格,不断地体验和重构跨时空的神圣共同体的群体记忆和群体社会表征体系,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群体社会认同以及和与他群体的符号边界。

三、如何区分宗教徒的圣/俗生活?

宗教原教旨主义

当代宗教徒的群体资格的获得和宗教认同的建构过程,发生在理性化、市场化和世界除魅的语境下。世界的去神秘化过程(demystification),自身非预期地播撒了两粒种子,一粒是世界的再神秘化过程(remystification),另一粒是反抗去神秘化过程。强烈主张世界的再神秘化过程,并反抗去神秘化过程的民众、组织和运动,也就是宗教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它以激进的宗教参与和宗教认同为表征(Emerson and Hartman, 2006: 128)。

必须再次强调,宗教资格只是宗教徒多元群体资格的一个面向,尽管是权重可能很重的一个面向。但对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而言,在其多元的

群体资格中,其宗教群体资格几乎在所有语境下都被激活,而具有显著性。

如何区分宗教徒的圣/俗生活?

可以把宗教徒在其宗教资格主导下的生活称之为宗教生活或神圣生活;而由其他多元群体资格所主导的生活称之为世俗生活或公民生活,在其中,公民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公民德行占据核心。

宗教徒的宗教生活是基于灵性资本,而世俗生活则是基于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或统称为世俗资本。宗教徒的灵性资本,在有些语境下,可能具有全能资本特性,可能转化为形式不同的世俗资本,如在神权国家中。尽管如此,因为灵性资本和世俗资本各自发挥作用的场域有别,宗教徒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社会或公民生活得以区分。

如果宗教徒的灵性资本蜕变为全能资本,或者说其灵性资本逾越其合法性的领域,替代或转换为所欲求的其他所有资本形式,宗教徒动态而多元的群体资格就已名存实亡,他/她所有的生活被宗教资格所主宰,他/她的宗教资格几乎在所有情景下具有显著性,而他/她的公民生活就被废弃。如果宗教徒的宗教资格几乎在所有情景下都具有显著性,他们的灵性资本就转变为生命资本。

极端宗教徒的灵性资本:生命资本

生命资本是指以生命为武器的意愿和能力。生命资本是所有人都拥有的潜在资本形式,它无价而唯一,无可替代也不可复生,它也是应该是终极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的手段。其价值超越所有的资本形式,具有神圣而超验的品质。生命成为生命资本,只有有限的几种可能。其一,绝望中的无助者。面对困境时,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倚靠,惟有生命,只有一次机会的生命。其二,杀身成仁的义士。他们用生命来成就理想、信念和忠诚。其三,极端的宗教徒。当肉体生命被认为是灵性生命或永恒生命的手段时,肉体生命的尊严就会被贬低。他们随时准备为其宗教资格和极端认同支付生命资本。而宗教性的自杀袭击者,就是基于极端的宗教认同而支付生命资本。

基于灵性资本,有可能识别潜在的宗教性自杀袭击者和其他宗教极端分子。恐怖主义是社会

学新的研究领域(Turk, 2004)。但如何识别和监控潜在的恐怖分子,仍然是研究上的挑战。基于灵性资本,有可能识别潜在的宗教性恐怖分子。因为对宗教性的自杀袭击者和其他宗教极端分子而言,宗教群体资格也许是其生命的唯一,在几乎所有情景下都具有显著性。他们时刻准备着用生命作为武器去实现自身对宗教资格的承诺和忠诚。他们的灵性资本必然和普通信徒有可觉知的差别。

简短的结语

宗教资源,可能成为公民德行建构的丰富原料。不同宗教体系共识性的伦理准则如“爱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已经是人类物种整体的共同美德。在这种意义上,信徒可能也是良好公民,他们能同时履行特定宗教徒和公民之职责。

但对极端的信徒而言,其公民生活的最大威胁,就是极端的宗教认同。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如何建构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从容而恰当的认同技术以强化公民认同,消解极端的宗教认同,并且使宗教认同成为公民认同建构的资源,就是最重大的挑战之一。直面所有这些挑战,群体资格路径可能提供洞识和灵感。

参考文献:

- 陈端洪, 2007,《宪治与主权》。北京:法律出版社。
- 方文, 2005,“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社会学研究》第1期。
- 2008a,《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8b,“转型心理学:以群体资格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2008c,“叠合认同:‘多元一体’的生命逻辑”,《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斯达克和芬克, 2004,《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杨凤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Annenman N. T. 2003, “Religious Identities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pp. 207—224 in M. Dillon e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ronson E., and Mills J. 1959 “The Effect of Severity of Initiation on Liking for a Group”.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9: 177—181.

- Beyer P. 1998 “The Modern Emergency of Religions and a Global Social System for Relig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13(2).
- Chaiken S., and Trope Y. (Eds.) 1999 *Dual-Process Theor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Guilford.
- Emerson M. O. and Hartman, D. 2006, “The Rise of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2: 127—144.
- Fan, R. M., and Moscovici, S. (Eds.) 1984 *Social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Vol. 7: 117—140.
-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94 “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 pp. 107—148 in C. Taylor et al.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A. Gutman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iggins E. T. et al 1977 “Category Accessibility and Impress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3: 141—154.
- Higgins E. T. 1996 Knowledge Activation: Accessibility, Applicability and Salience. In E. T. Higgins and A. E.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133—16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Lamont M., and Fournier, M. (Eds.) 1992, *Cultivating Differences: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mont, M., and Molnar, V. 2002, “The Study of Boundar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8: 167—195.
- Lichteman, P. 2008. “Relig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c Ident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3: 83—104.
- Marshall D. A. 2002 “Behavior, Belonging and Belief: A Theory of Ritual Practice”.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0 No. 3: 360—380.
- Michelman, F. I., 2001, “Morality, Identity and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Ratio Juris*, Vol. 14 No. 3: 253—271.
- Moscovici S. 2000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Polity.
- Somers M. R. 1994, “The Narrativ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5: 605—649.

Tajfel, H. 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jfel, H., and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 Worchel et al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7—24). Chicago: Nelson-Hall.

Taylor, S. E. 1998 The Social Being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D. T. Gilbert et al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2Vol. s) (Vol. 1: 58—95). New York: McGraw-Hill.

Turk, A. T. 2004 "Sociology of Terror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0: 271—286.

Venter, B. 2003 "Spiritual Capital: Theorizing Religion with Bourdieu Against Bourdieu".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1, No. 2: 150—174.

Yang, Fenggang(杨凤岗), 1999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在“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北京大学2008年10月9—10日)上宣读,其写作和修改受惠于杨凤岗、卢云峰、高丙中、杨美惠、高卉和赵蜜的指点和批评。谨此致谢。

The Believer-citizen Dilemma in The Polity: The Membership Approach

Fang W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or those citizens who are religious believers, their commitment to transnational religious community might transcend their loyalty for political community, thus become a political barrier that threatens the solidarity of a political entity. This may be called the believer-citizen dilemma. On the base of adhesive identities and in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memberships of an actor,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and explain this kind of dilemma.

Key words: believer-citizen dilemma; adhesive identities; multiple memberships; spiritual capital; life capital

(责任编辑 何方)

首届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在北大举行

2009年6月7日,“北京大学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来自法国、美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60位修辞学、语言学、新闻学、传播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本届论坛以“多元文化与多学科交叉中的修辞传播学研究”为主题,以多元文化、多元文明为视点,瞄准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等角度,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修辞传播学发展的新态势。国际修辞学史学会前会长洛郎·白傲诺,世界汉语修辞学会会长兼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陈汝东,韩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田圣淇和现任会长朴禹洙等国内外资深学者,分别做了题为《古代欧洲文明中的修辞学》、《论建筑修辞学》、《关于人文科学学术交流中的波修辞》、《代笔韩国:罗伯特·奥利弗及其修辞在韩国建立中的助推作用》等大会报告。

日本札幌大学张伟雄、浙江大学施旭、福建师范大学刘亚猛等国内外学者,就语言传播与文化理解、亚洲话语研究等东西方修辞、传播学发展的若干前沿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学者认为,修辞不仅是一种技巧、技能和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秩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修辞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学科、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态势,新兴交叉学科修辞传播学的出现为修辞学的发展壮大开拓了空间。

(丛欣 讯)